

· 战史论坛 ·

太平天国与地方势力的较量*

——咸同之交诸暨包村之战探微

刘 晨

摘 要: 咸丰、同治之交的浙江包村, 曾经发生一场持续半年多的惨烈之战。乡农包立身率领数千东安义军抵抗太平军 5 万、10 余万人, 太平军六次征伐, 终将包村攻破。包村老少靡有子遗, 约有数万人丧生。包立身及其“义军”别具中华帝国崩溃时期地方精英阶层的某些特性。包村之战还是近代中国军事史上—场战争技艺的强力交锋, 主要表现在战略和战术两个方面。通过这一个案研究, 可以透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 探寻太平天国的兴亡轨迹。

关键词: 包立身 地方精英 太平军 太平天国

中图分类号: K25; E2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451(2014)02-0072-10

作 者: 刘 晨,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包村, 处浙江诸暨县城东北 70 里, 风景迤邐, “枫溪带其前, 白塔湖环于后, 林深箐密”,^①“包姓聚族居之”,^②原本是一个声名不著、平静祥和的村落, 却因清代咸同之交发生的一场历时 9 个月、死伤数万人的悲烈战事而被推到历史的风口浪尖。然而, 学界对于包村事件及其主人公包立身的关注甚少, 除了美国学者柯慎思(James H. Cole) 的短篇论著《民众对抗太平军》以外, 以往国内学者的叙述均过于简略, 主因是囿于当时意识形态的固定思维模式(比如称其为“反动地主武装”“地主团练”等)。^③ 在当今学术面貌发生深刻变化之时, 唤起人们对这场被遗忘的战事的重新审视, 尤其是深化当时活跃在社会上的第四方势力——地方精英阶层与太平天国衰亡之关系的认识, 很有必要。本文依据清朝档案史料和文人笔记、日记, 结合 2010 年浙江田野调查所得资料, 对包村之战及其与太平天国衰亡诸关系作一探讨, 以求教于方家。

包立身画像



图 1 包立身画像

* 本文为 2010 年浙江诸暨包村田野调查成果之一, 获得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传记——农民领袖》、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校长奖学金等项目资助。特别感谢刘平教授、郭卫东教授为本文提出修改意见。

①佚名《秦鬟楼谈录》,《清代野史》第 7 辑,成都:巴蜀书社,1988 年,第 260 页。

②半窝居士《粤寇起事记实》,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 1 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 年,第 16 页。

③主要研究成果有严修《太平军诸暨之战与包立身》,《光明日报》1962 年 12 月 19 日,第 4 版;贾熟村《浙江诸暨之包村包氏》,《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207—214 页;王兴福《根据地内镇压地主武装和包村之战》,《太平天国在浙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第 151—157 页;James H. Cole, *The People Versus the Taipings: Bao Lisheng's "Righteous Army of Dongan"*.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s, 21.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81.

一、包村之战素描

包立身,又作“立生”“立胜”,年20余,^①普通农家子,世居包村,识字无多。自称受仙得道,常焚香默坐,预言吉凶,乡民称之“包神仙”。^②咸丰十一年(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1861年)九月,太平军破绍兴、诸暨,包立身树旗起事,号“东安义军”,杀太平军乡官,拒编门牌,公然对抗太平天国。

(一) 太平军一打包村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初三日,太平天国墩天燕柳某派兵3000余进攻包村。是日,大雾四塞,包兵设伏,太平军“受伤者纍属于道”。^③立身初战告捷,发布檄文,“远近归之者复日以千计”。^④

(二) 太平军二打包村

十二月初十日,太平天国绍兴守将来王陆顺德派兵千余再攻包村。包兵坚壁不出,以逸待劳。太平军溃败,被俘30余,伤亡百余人。

(三) 太平军三打包村

同治元年(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1862年)正月十六日,太平天国低天豫余光前率兵4000攻包村失利,亡400余。二十五日,太平天国见天安姚克刚、勅天福胡兴霖率两万众复来,中埋伏再败,亡2000余。二十七日,太平天国陆顺德率兵4万设伏于壁岭外,派百余人入包村诱战,包立身识破其计谋,斩敌30余,不追。

(四) 太平军四打包村

太平军连番不胜,致函招抚,包立身“斩使焚书以激贼”。^⑤二月十五日,陆顺德合杭州练王陈、嵊县主将周、洽天义余所部数万,齐集包村。包立身邀古塘陈朝云所部民团“胜义军”来援。太平军伤亡万余。

(五) 太平军五打包村

三月,太平天国江南省武将帅皎天福孟文悦与其弟镕天豫往征包村。包立身率千余人迎战,为流弹所中,被亲军救回,包兵大败。是时,陈朝云复援包村,太平军败,亡5000余。

(六) 太平军六打包村

^①关于包立身之年龄,史料记载其起事前年20余,但据采访调查所得包立身画像(图1,光绪二十八年包村后人寻得于九里洲余庆庵,《诸暨民报》据之影印),系一老者形象。考包村至今流传有太平军破包村后包立身未死而是出游四方的传说。笔者认为,传说与画像之长者形象或是体现了包村民众的愿望而已。

^②对包立身“神仙”之说,时人多有非议。时任诸暨县令许瑶光指出“其遇仙事与黄石传书颇相类,无甚异也,即其所授之咒文出道藏,亦无甚异也;……抑以农家子目不识诗书,又无势位名望资财足以雄视一方,招致乡里,乃云聚雾结,至数万人,群奉为神师,其中固有阴为之主持而驱策者也,岂果立生所能自为哉?”〔许瑶光《谈浙》,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年,第612—613页)左宗棠奉命调查包立身事迹,声称“传闻异词,未敢遽信其真可倚任。”〔《台州宁波郡县克复温郡渐就肃清折》(同治元年六月十六日),《左宗棠全集·奏稿一》,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60页)钱塘夏树桐指出“至包公,为人平平,无他异,不过诚信素孚,肯任事不怕死耳。世俗所传种种神奇,举不足信,被围后以越人好诞信鬼、托言神仙以鼓励人心则有之,实非别有所挟持也。此言最确。陈昼卿观察所述,已多传说;若白蜃仙人一说,尤恹恍纒。”(浙江采访忠义局编《浙江忠义录》,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第413页)笔者认为,包立身实为文化水平不高但有野心的普通人,其成事必有谋士指点。

^③包祖清编《义民包立身事略》,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7册,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第485页。

^④《暨阳东安包氏宗谱》卷1,“宗传难后弁言”,宣统二年(1910年),第18页。

^⑤《暨阳东安包氏宗谱》卷1,“立胜先生传”,第76页。

四月,太平天国“东调宁波,西调杭州,南调金华,集大队与抗”。^①五月,侍王李世贤、戴王黄呈忠、梯王练业坤、首王范汝增、来王陆顺德5王率10余万太平军第六次围困包村,立誓“不破包村不还”。^②太平军中甚至流传有“甘弃南京而破包村”^③之语,战斗异常激烈。六月,凌天义周文嘉(后因功封“宁王”)断包村水源、粮道。七月初一日,太平军穴地道而出,包立身与其妹美英战死。据浙江巡抚蒋益澧奏称,包村之役“阵亡殉难官绅男女统计一万四千七十七名”。^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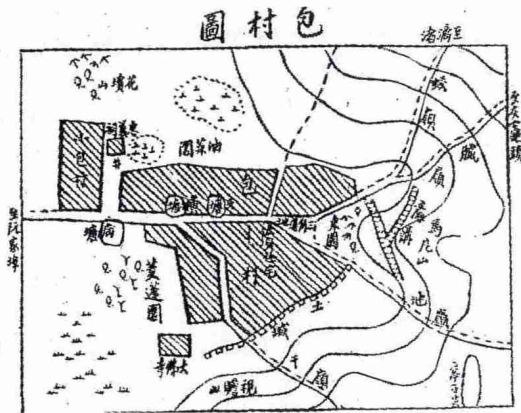


图2 包村防御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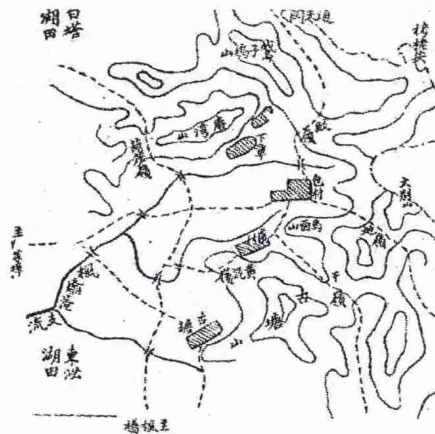


图3 包村地形图

二、包氏集团的特性

按照美国学者孔飞力(Philip A. Kuhn)的研究,咸同之交的中国正处于“传统国家的崩溃”期,统治者再也无法沿着既有的路线重新组建一个统一而有效的政府。^⑤以包立身为首的包氏集团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出“传统国家崩溃”的某些征象。

(一) 浓厚的平民性

与其他乡团不同,包立身既非地方士绅,又非传统乡村名流,不是旧有秩序、制度的利益既得者,实是地道的农家子,是起家于传统乡村社会的平民精英。

在当时和后来的文人笔记、野史中,多有包立身“世业农”“农家子”“本村毗”“家世力农”的记载。美国学者柯慎思通过对“包立身家族和世系”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包氏家族无论其大小,它都不是一个专门培养朝廷官员的传统意义上的家族。”^⑥包立身不但务农,还从事行商行当,“尝往

① 隐名氏《越州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第770页。

② 王彝寿《越难志》,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1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38页。

③ 包祖清编《义民包立身事略》,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7册,第479页。

④ 包祖清编《义民包立身事略》,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7册,第475页。2010年8月包村田野调查,发现一块民国“包村忠义祠碑”称“士卒妇孺随殉者十九万人”,十月间“主客死者至三十万”(据采访调查实物)。笔者认为,碑文所记夸大,但蒋奏所记仅指包村破时死亡之数。经实地调查(图2、图3),包村地处一面东北—西南走向的大缓坡上,东、北方向山势绵延险峻,往南则为漫长缓坡,这使得包村民众层层修筑围墙抵抗太平军成为可能。另外战事历时9个月,每次战斗的死亡者都会被随时随地掩埋,包村实际死亡人数不止于此。

⑤ [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谢亮生、杨品泉、谢思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21—232页。

⑥ James H. Cole, *The People Versus the Taipings: Bao Lisheng's "Righteous Army of Dongan"*. p. 22.

来肩贩石灰”^①足见其出身微末。另考包氏集团核心成员,如包建勋、包立贤、包立忠、包立潮、包美英等皆农民,包立身之姑表兄弟冯仰山,系佐杂班成员,亦属下层民众。^②因此,包氏集团属于平民集团无疑。

(二) 强烈的自保性

包立身起事,不同于一般乡团之“奉札办团”,包村既不奉清朝正朔,也不接受太平天国招抚,其目的在于自卫。包立身起事之初,发布檄文,宣誓起义之宗旨在于“因苍黎之属望,救水火于蒸民”。^③包立身希望通过家族、区域、宗法结成一条保卫桑梓的统一战线,檄文通篇没有攻击太平天国的反清思想,更没有表达对满清王朝的忠诚。

正是由于包立身不与清政府合作的立场,时人言包立身“有异志,不以朝廷为念”。^④李慈铭为其辩解道“其称壬戌十二年,以尚不知有同治之号,故从咸丰十一年数之,或言其意有异者,非也。”^⑤包村之变出于桑梓之难,倘若没有太平之乱,包立身或无起事时机。但这不能否定包立身有野心,正是包村地处太平天国的控制区,包立身对清王朝的“叛乱性”才被对太平天国的“叛乱性”掩盖了。

有史料记载“时客有谏立身者,尝以赵景贤之守吴兴相比例。立身谢客曰:彼为清朝耳!予守包村土地,为国为民,予无满洲守土责任也。……其文告皆书甲子,词意皆以独立为宗旨。”^⑥又有记载称“包不愿称官”,“自号‘先生’,建旗帜曰‘东安义军’”。^⑦

(三) 系统的集团性

包氏集团属于太平天国的叛乱者,但与苏镜蓉^⑧、吴方临^⑨等其他士绅武装相比,包氏的“叛乱”更为系统,在共同的宗教信仰下建立起严格的组织纪律。

首先,社会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多从信仰、仪式、象征三者互联之系统认定宗教,从这一角度看,包氏集团具有比较系统的宗教特征。包立身建立了与太平天国拜上帝教^⑩对立的宗教体系。

①陈橘声修,蒋鸿藻纂:光绪《诸暨县志》卷15,宣统三年(1911)刻本,第4页。

②包氏核心成员阶层属性,参见贾熟村《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第210页。

③海宁冯氏《花溪日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第702页。

④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5册,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3108页。

⑤包祖清编《义民包立身事略》,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7册,第483页。

⑥包祖清编《义民包立身事略》,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7册,第478页。

⑦包祖清编《义民包立身事略》,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7册,第481页。

⑧苏镜蓉,字品三,浙江黄岩人,清朝候补道员,1861年在台州兴办民团对抗太平军,连克台州六县,受到清廷嘉奖。

⑨吴方临,浙江上虞人,1862年春在四明山大岚(今属余姚)组织民团对抗太平军,后在上虞双溪岭战斗中被害。

⑩关于“拜上帝会”之名称,夏春涛先生考证应为“上帝会”,太平天国宗教为“上帝教”。(夏春涛《“拜上帝会”说辨正》,《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这一说法已为多数学者认可。但路遥先生认为,按照社会和文化人类学认定宗教的三个特征,称太平天国的宗教为“拜上帝”的宗教似乎要比“上帝”的宗教更为确切。称“上帝教”,只象征其信仰的观念形态;称“拜上帝教”则兼具信仰与仪式之形态,而且突显象征的融合。(路遥《关于太平天国宗教研究的几点思考》,“中华文史网”,<http://www.historychina.net/sxwh/358252.shtml>,2006年9月12日。)笔者赞同此说。事实上太平天国官方并没有正式对其宗教组织命名,无论“上帝会(教)”还是“拜上帝会(教)”都是他称。而“拜上帝会(教)”之称已约定俗成,故笔者在文中仍沿用此称呼。

立身本人,“持斋归教门有年,其教主曰白鹤真人”^①另有“白玉蟾”^②“白吼(猿)精”^③之说。但无论师系何人,包氏之教必有自己崇奉的名誉上的教主。包立身奉其为师,“托词誓师,谓斗岩之神梦告”^④“教以兵法,并遁甲诸术……不入田,屏酒肉,云遵其师教也”。^⑤这与洪秀全所梦上帝令其下凡斩邪留正的神话如出一辙,包氏之教职制度及组织(政教合一)亦与太平天国天父天兄的神教体系相类。

包氏之教还有自己的仪式。据载,包立身“作道士装,色纯白,左右侍者擎衣负剑,……恒焚香默坐如枯禅”;^⑥“白衣披发,步罡仗剑,喃喃诵咒语,若有所授,居而侦之,望见白气满山,包方舞蹈膜拜,若有见闻,而人不知也”。^⑦包村色尚白,除与太平军五行相对这层含义外,或与其教仪有关。包立身时有焚香坐禅,时有舞蹈膜拜(当系祭祀包师),这套仪式也具备了宗教特征。

至于包氏之教是否有自己的经典,缺少记载。战时情况,应不完备,但有记载称包立身有“兵书宝剑符篆”。^⑧

包氏之教已颇具宗教雏形。与拜上帝教相比,包氏之教纯属土生土长的中国民间宗教,以师承关系为组织基础,云“俟桃花水发时,师徒及同门兄弟聚会”;^⑨发令必假神仙,以坐禅念咒、“日夕斋醮”^⑩“卜晴雨休咎”^⑪等方式吸引下层民众。在战乱纷起的年代,符合百姓的求生欲望,又可形成暂时的群聚效应。于是,包村之民、来归之众群奉其为神师,“同居一村中,皆教党也”。^⑫正如许瑶光所言,包氏之教是“人自惑之而人自附之”,^⑬出于邪而制于邪,这也是太平军为什么誓必灭之的原因之一。

其次,包氏集团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在服饰装束方面,包村之众“戎装服饰皆以白”,^⑭“相约剃发”,^⑮严格区别于太平军的服饰、发式,对抗之意明显;在组织机构方面,“以东、安、忠、义四字分四大营”,“有文案、支应等局”,^⑯以包姓亲族为各营总制,建立起私人武装集团;在防御建设方面,“村中累(垒)土为外城,编篱为内城”,^⑰广储军械,制造炮船,俨然独立王国。

①沈梓《避寇日记》,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30页。

②王彝寿《越难志》,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1集,第236页。

③包祖清编《义民包立身事略》,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7册,第481页。

④镜澄氏《包村纪事汇编》,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天国史研究室编《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2页。

⑤王彝寿《越难志》,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1集,第236页。

⑥李滨《中兴别记》,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2册下,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36页。

⑦包祖清编《义民包立身事略》,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7册,第481页。

⑧陈锦《勤余文牍》,《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1548册,第641页。

⑨沈梓《避寇日记》,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131页。

⑩陈锦《勤余文牍》,《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548册,第641页。

⑪陈锦《勤余文牍》,《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548册,第641页。

⑫沈梓《避寇日记》,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131页。

⑬许瑶光《谈浙》,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第613页。

⑭《暨阳东安包氏宗谱》卷1,“立胜先生传”,第76页。

⑮杨德荣《夏虫自语》,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第783页。

⑯包祖清编《义民包立身事略》,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7册,第483页。

⑰包祖清编《义民包立身事略》,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7册,第476页。

这样一个顽固的敌对势力,对太平天国的危害极大。在兵戎相见之前,包立身就屡屡杀戮太平军,李秀成之子、旅帅唐伟堂、乡官潘某、姚某均命丧其手。包氏集团对太平天国重建乡村秩序的努力形成极大威胁,严重阻碍了太平天国政治权力向乡村地区的渗透,这或是太平天国宁愿付出前所未有的沉重代价扫灭包村的动机和根本原因。

三、太平军包村之战战略战术分析

包村之战,在中国历史舞台上,除去敌对双方在文化、信仰诸方面的剧烈冲突,我们看到更多的则是一场战争技艺的强力交锋,主要表现在战略和战术两个方面。

(一) 战略分析

盛巽昌先生评价太平军包村之战的战略时说“为了征服一个小小的包村,竟调动了十几万精锐,旷日持久,而不及其它,足见太平天国诸王们全凭头脑发热,意气用事,实在没有一点儿战略思想。”^①其实不然,太平军围剿包村是完成平定浙江全境的既定战略目标的必要一步,从实际军事行动看,是有准备、有计划的。尽管太平军因之付出的惨重代价与实际战略收益并不相符,但包村的危害性在太平天国控制区异常显著,包氏集团极大的危害与战事本身的战略意义不相冲突,不能因为其地战略收益相对较小而忽视其危害性,更不能因包村具备强烈的自保性而使之成为太平天国政权辖区内的割据势力。当然,太平军完全不顾及战略可行性以及因之可能产生的恶劣后果也是严重失策。

包立身起事时明确指出其战略意图在于:“今官军据衢上游,洋人扼宁下口,吾从中缀其兵势,恢复可冀也。”^②而包氏集团也确实起到了这种牵制作用,“浙江丧乱之后,闽若豫尚能高枕者,实恃此区区一旅,为之牵制,不能远涉。……贼在当时,实有不能兼顾之势”。^③时人评价太平军包村之战的战略说“时吴越被陷之城,官军力图收复,围剿甚急,贼欲往援,而恐立生率众蹙后,势难遽退,决意攻破此村。”^④因此,太平军打包村,不是该不该打的问题,而是怎样打的问题,但太平军恰恰在战略的具体实施上犯有致命的错误。

太平军前三次征伐包村都是出动千余兵力的试探性进攻,第四次、第五次才因数番之辱出动了数万兵力,第六次能够出动10余万兵力的原因在于:“(清军)方平复宁郡,败匪数十万退至诸暨,屯扎包村近地,金华贼首意欲复宁郡,而暨邑为浙东吭喉,暨不收则是扼其吭,而金、宁仍梗塞”。^⑤宁波失守,10余万太平军突围至诸暨,于是有了集中有生力量、派遣大兵团解决包村的可能。这本是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有效战略,但攻打包村的前几战只出动少批队伍未果,太平军已失去战机;此时浙江战局不利,大兵团攻打一处村落不但时机不对,更是战略运用上的失策。

六打包村,对太平天国东(上海之战)、北(天京保卫战)、南三线战场都造成了恶劣影响。最直接的损害是导致南线浙江郡县的失守。太平军第六次攻打包村期间(同治元年四月至七月),浙江郡县失守情况如下表:

^①盛巽昌《太平天国文化大观》,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404页。

^②镜澄氏《包村纪事汇编》,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天国史研究室编《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第262页。

^③隐名氏《越州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第770—771页。

^④半窝居士《粤寇起事纪实》,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第17页。

^⑤包祖清编《义民包立身事略》,国家图书馆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7册,第480页。

郡名	县名	失守时间(同治元年,1862年)
杭州郡 治所:钱塘县 仁和县	昌化县	四月二十四日(5月22日)
	镇海县	四月初八日(5月6日)
宁波郡 治所:鄞县	鄞县	四月十二日(5月10日)
	象珊(山)县	四月十二日(5月10日)
	奉化县	四月十四日(5月12日)
	义县(慈溪县)	四月十六日(5月14日)
	新昌县	四月初四日(5月16日)
绍兴郡 治所:珊(山)阴县	余姚县	七月初八日(8月3日)
	淳安县	四月二十八日(5月26日)
严州郡 治所:建德县		
温州郡 治所:永嘉县(清占)	乐菁(青)县	四月十九日(5月17日)
	仙居县	四月初三日(5月1日)
台州郡 治所:临海县	临海县	四月初九日(5月7日)
	黄岩县	四月初十日(5月8日)
	太平县	四月十一日(5月9日)
	宁海县	四月十五日(5月13日)
	缙芸(云)县	四月初十日(5月8日)
处州郡 治所:丽水县	景宁县	五月十六日(6月12日)
	芸(云)和县	五月十九日(6月15日)
	菁(青)田县	六月十三日(7月9日)
	松阳县	六月十九日(7月15日)
	宣平县	六月二十二日(7月18日)
	丽水县	七月十九日(8月14日)

(按,该表参照酆纯《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下编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下册,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华强《太平天国地理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4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浙江各府县相关地方志。)

考太平天国浙江天省辖9郡70县,太平军第六次攻打包村期间失陷22县及宁波、台州、处州郡城3座,失陷比例高达31.4%。这些城池的失陷主要是由左宗棠率新练湘军入浙造成的。在太平天国浙江最高统帅李世贤所部与左宗棠的湘军恶战于江山、衢州之时,浙东、浙南各地大多失陷于兵力分散、防守不足,而此时太平军的十数万机动兵力却深陷包村泥潭,不能脱身。曾有人这样评论说“官军由嵊邑分道克余姚、上虞,时贼在包村,犹未回城也”,^①“贼之悍党俱萃于包村,而左公遂由温、衢二州顺流而进取”。^②

包村之战,太平军损失惨重,数万将士殒命一隅,更为惨痛的教训是战略失误导致浙江腹地空虚,各地纷纷告警,严重危害到太平天国的全盘战局。正如时人所言:

黄雀已来蝉尚翳,螳螂何事竟忘生。

桑榆未得东隅失,应悔区区蛮触争。^③

(二) 战术分析

^①包祖清编《义民包立身事略》,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7册,第485页。

^②《暨阳东安包氏宗谱》卷1,“尚瀚公传”,第68页。

^③包祖清编《义民包立身事略》,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7册,第485页。

太平军前三次攻打包村,包立身或是利用太平军不明地形的弱点,采取突击战术;或是以逸待劳,打伏击战。太平军屡败于此。

太平军攻打包村,特别是前几次战斗,在战术应用上暴露了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穴地攻城运用不足。太平军前几次攻打包村的战斗片面执着于相对落后的攻坚战术,使用穴地攻城的时机似显过晚。

第二,攻坚拒援能力较差。大兵团进军,太平军在战事初始明显处于优势,但两番连败于包立身与陈朝云的夹击战术。可见太平军在攻坚打援的协同上存在问题。

第三,战术机动相对滞后。一次,太平军攻包村以火牛阵冲锋,但包立身早已探知,并做好御敌准备,“牛群刚一进村,便被极高的一堆炬火吓回去了。这堆极高的火焰使牛群非常惊恐,它们掉头而逃,冲进尾随的太平军中,许多太平军便这样悲惨的被戳死了”。^①前几次战斗,太平军的战术相对滞后,以致其战术系统多次被包立身攻破。

(三) 结局探因

至太平军抽出有效兵力,以数万之众从容进军,包村的地理优势逐渐消失,转变为两大阵营短兵相接的阵地战。太平军步步为营,深沟高垒,作长围之困。

包村最后被攻破,从太平军方面说:

首先,太平军第六次进军,步步为营,先肃清包村外围去其枝叶,主次分明,稳扎稳打。通过消灭古塘陈朝云所部援军弥补了自己攻坚拒援能力差的弱点。

其次,第六次攻打包村,太平军的战术手段不落俗套,屡次使用战术诡诈。其一,伪装。“伪员罗天义白其戎装,诈称大梁援兵,于五月六日从锭子尖抄入村后”,^②“削发效满装若援兵者以尝之”。^③其二,劫营。(立身)令各队长遍警营防,各备战具,以防劫营,众阳诺而未深信,顷刻贼果至”。^④其三,炮击掩护与穴地攻城。太平军一面以火炮明攻包村,一面另辟蹊径,“阴穿隧道而以金鼓声乱之”,^⑤最终穴地而出。太平军放弃不计损失的强攻方案,战术交叉运用,使包村顾此失彼,疲于应对。

最后,切中要害,断其命脉。用兵作战,粮草、水道至关重要。太平军断包村水源、粮道,使其民心浮动,不战自乱。

从包村方面说,整个系统已形成恶性循环:

第一,天灾。“天自五月起至七月杪竟无点雨”,^⑥以致包村民众“析糠为糜,抔血而饮”。^⑦

第二,瘟疫。咸、同之交,江南瘟疫流行。^⑧包村“觸尸秽,饮水毒,疫死什一”,^⑨当然包村瘟疫也与人口聚集过多造成的生存环境恶化有关。

第三,有生兵力的削减。瘟疫、灾荒、战役造成包村兵力的损耗,“一战再战,兵已去其三四”,“众寡

①《英国档案馆所藏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节选),王崇武、黎世清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辑,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年,第29—30页。

②包祖清编《义民包立身事略》,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7册,第480页。

③包祖清编《义民包立身事略》,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7册,第478页。

④包祖清编《义民包立身事略》,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7册,第480页。

⑤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5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654页。

⑥《暨阳东安包氏宗谱》卷1,“何光公传”,第81页。

⑦《暨阳东安包氏宗谱》卷1,“友孝公传”,第62页。

⑧参见余新忠《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

⑨包祖清编《义民包立身事略》,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7册,第482页。

已殊”。^①

第四 环境承载力不足。包村尺寸之地 人多地少，“村中结茅依树 鳞次栉比 几不漏天日”^②“席篷无隙 尺地如金”。^③ 人口众多与包村环境承载能力有限的矛盾 引发食物、房屋、田地不足 而生活条件的困苦又是疾病、瘟疫、民众离心倾向的诱因之一。

第五 信仰的崩溃。包氏宗教体系初始发挥出的巨大能量 但在战斗和物资的消耗中濒临崩溃：“包不得已更托奇术安众心 众亦疑信交集”^④“后知其说讹也 众皆失望”^⑤“人心瓦解 多出怨言 或切齿呼立身名 痛詈之”。^⑥ “疑信交集→众皆失望→人心瓦解”这一过程反映了包村军心民心随着战事的发展而发生的变化。另外 包立身任人唯亲 建立起包氏一姓的私人武装和极权政治 其他非包姓成员日久必然思变。包立身个人领袖魅力的下降导致信仰体系的坍塌 最终表现为包村攻防能力的锐减。

第六 整体实力处于劣势。包立身起事正值太平军再破江南大营 席卷江浙之际 以数千之众、尺寸之地抵抗太平天国几个省的兵马 力量对比 处于劣势。其前几番的胜利只是暂时的 而最终悲惨的结局则似乎并不出人意料。

结语

太平天国时期的浙江 雨骤风狂。以乡农包立身为首的包氏集团 严重阻碍了太平天国政治权力向乡村社会的渗透 太平军誓必灭之。包立身及其势力集团 拥有当时其他太平军敌对势力所不具备的特性。通过这些特性 以包村一区和有别于其他地方精英的平民精英包立身为个案 透视中国社会结构正悄然发生着某些变化 如地方军事化趋势、乡绅阶层及绅权的扩大、平民精英势力的崛起、异端宗教团体的增多等 或可发现 传统中华帝国的崩溃已在小小的包村初现端倪。

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 地方上除包村包氏外 还存在众多仇视太平天国的“第四方势力”——除清政府、太平天国、西方列强三股政治势力以外的地方精英阶层。在太平天国战争波及的地方社会 地方精英阶层的政治取向有所变化：一是以赵景贤^⑦、谢敬^⑧、苏镜蓉等为代表的地方士绅 他们大多拥有功名 依靠清政府的力量兴办团练 坚决反对太平军；二是以徐佩瑗^⑨、费玉^⑩等为代表的骑墙派 名誉上向太平天国进贡归附 实际持观望态度 投机于清政府和太平天国之间 最后随政治局势的明朗纷纷倒戈；三是以包立身为代表的“平民精英” 他们起身微末 为“保卫桑梓”而战 最后联合并跻身于地方精

①王彝寿《越难志》，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1集，第238页。

②王彝寿《越难志》，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1集，第237页。

③包祖清编《义民包立身事略》，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7册，第482页。

④包祖清编《义民包立身事略》，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7册，第482页。

⑤沈梓《避寇日记》，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143页。

⑥王彝寿《越难志》，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1集，第238页。

⑦赵景贤，字竹生，浙江湖州归安县人，恩科举人，1853年在湖州兴办团练对抗太平军，1861年清廷赏封按察使衔。1862年太平军破湖州，赵景贤被俘，后在苏州被杀。

⑧谢敬，字仲逸，浙江余姚人，1858年奉命办团镇压余姚十八局佃农起义，1862年10月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被俘被杀。

⑨徐佩瑗，字少蓬，苏州长洲县永昌人，清朝监生，后捐道员。1860年兴办枪船对抗太平军，后受太平军招抚，封为燕爵。1863年徐佩瑗联络太平军将领钱桂仁、骆国忠阴谋叛变降清，事泄被杀。

⑩费玉，又作费阿玉，本名费秀元，又名费玉成、费玉存，世居苏州吴江南町村，迁居周庄。1860年兴办枪船，后受太平军招抚，封镇天燕。费玉1862年病死，其子费金绶继领枪船，公开与太平军作战。

英阶层,对清政府和清朝军队的依赖性小;四是还有少数地方精英如“莲蓬党”首领何文庆^①,政治立场虽较为倾向太平军,但“听封而不听调”,拥兵自重,对太平天国政权仍有一定危害,最终被清军及其他地方势力消灭。地方精英阶层中的这四股势力都拥有相当数量的军队,起事的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但是,太平天国对地方精英阶层的政策是失败的。在地方精英阶层中,由于大部分人对太平天国持仇视立场,因此太平天国政权始终也没能建立起对地方社会的有效控制,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失控。比如太平军破包村后,既不驻军,又不委官,弃之不顾。据采访调查,包村失陷一年多后,幸存者才进入村子清理战场,于村中心建“忠义祠”,立石屋五间叠放尸骨,题曰“十万人墓”(大跃进期间被毁,改建为公房),包村“社会失控”达一年以上。可以说,第四方势力——地方精英阶层——的政治取向,是关系太平天国存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另外,包村强烈抵抗的原动力,产自当时民间长期存在的“长毛妖魔化”意识。太平军的“妖魔化”,既是受清政府政治宣传攻势的影响,也是后期太平天国残酷的农村政治、太平军军纪废弛及破坏性严重的恶果。诸暨一带至今还流传有“一副长毛相,迟早要杀头”的民谣。但太平军的破坏性还不能完全归因于太平军本身,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的大动乱、人口流失,除与战争杀戮有关外,还与自然灾害、移民与城市化(如上海的崛起)^②、恐怖自杀等因素有关。

包村之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后期太平天国历史的发展变迁。太平军以5万十数万兵力围困包村一隅,历时9个月,是太平军战力严重下降的预警。陈玉成、李秀成曾以数万之众消灭湘军6000人,取得三河“大捷”,包村之战更是以众敌寡的大兵团阵地战的典例。但东安义军无论是战力、装备还是给养都远不及湘军。包村之战太平军虽勉强获胜,胜利的代价却是极大的,正所谓“收之东隅失之桑榆”,一年多后,不但浙江太平军全线溃败,其都城天京最终也被湘军攻破,这宣告了天国的陨落。所以,包村的命运,同样预示着太平天国未来的命运。

(责任编辑 张 陈)

^①何文庆,浙江诸暨人,借办乡团之名组织“莲蓬党”,1861年10月响应太平军,封志天义,镇守镇海、绍兴等地,1863年3月病死于萧山。

^②参见R. J. 史密斯《十九世纪中国的常胜军:外国雇佣兵与清帝国官员》,汝企和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